

## 焦點評析

中印邊境衝突中的貿易因素：  
貿易和平效果的局限性The Limited Liberal Commercial Peace  
Effect in the 2017 Sino-Indian Border  
Conflict薛健吾 *Chien-wu Alex Hsueh*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一、前言

過去十餘年來堪稱穩定的中印關係，在今年(2017)的年初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變化。首先，在一月和四月的時候，印度方面開始在爭議邊界積極修建地堡和軍用公路，接著，中國在四月中時候，公布了位處爭議邊界的藏南地區的六個地點的標準化官方名稱，宣稱對這些地區擁有主權，此舉引發印度不滿，也隨即在四月底在邊區前線建造了兩個飛機著陸場。五月底，印度一架戰鬥機從雷達上消失，並且在由印度實際佔領但中國宣布擁有主權的藏南地區發現墜毀的該機，雙方的敵意又升高一層。六月中時，中國在與不丹有領土爭議的洞朗地區進行道路施工，印度隨即應不丹政府的請求，派遣部隊阻撓中國的修路工作，中國也透過外交途徑向印度提出嚴正要求，要求印度將軍隊撤回印度領土。六月和七月時，印度方面有媒體開始報導「中國軍隊已越過邊境入侵印度領土」，然而印度的官方

說法始終維持「印度的領土並未遭受中國入侵」，而中國官方的說法也一直維持著「印度應該老老實實的退回印度領土」的基調，若把這兩邊的官方說法加起來看，這兩句話其實隱含著一種「中國軍隊並未進入印度領土、印度軍隊已經進入中國領土」的弦外之音。從七月底開始，中印雙方的軍隊開始在邊界對峙，但均十分克制己方的行為，雙方皆未發生實際的軍事衝突。這種對峙的狀態一直持續到 8 月 15 日，才以一種相當滑稽的方式被打破。該日雙方軍隊在邊界的拉達克地區發生零星衝突，雙方竟採取用互相投擲石塊的方式來解決，某種程度上也突顯了中印雙方雖然都想要對爭議領土宣示主權但又對於實際發生軍事衝突充滿顧忌的最高指導原則。中印雙方在爭議邊界的對峙狀態持續至今（2017 年 10 月），而雙方高層在中間的過程中也持續不斷地在各種場合中交流談判。

在這次的中印事件中，一個很明顯的趨勢是，雖然雙方都不願對於爭議領土有所退讓，然而即使如此也極力克制對於武力的使用，8 月 15 日出現的互扔石塊事件，更是突顯本次爭議的精髓。關於中印雙方為何如此節制不讓爭議升高到武力的使用，不同的分析家也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說法，有一種說法是因為中印雙方的貿易關係深厚，所以使得兩造都顧忌因為衝突的出現而影響到貿易的利益，本文的目的，就是從理論上來探討貿易因素在這次的中印衝突中可能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又具有多大的重要性，據以分析雙方的貿易互賴關係是否可能成為節制雙邊衝突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首先分析貿易如何帶來和平或是衝突的理論，找出中印雙邊貿易可能存在的和平或是衝突效果；接著分析中印雙方自 2001 年中國加入 WTO 以來的貿易關係；最後，根據這兩個部分的理論與經驗資料分析提出本文的結論。本文認為，即使中印雙方的貿易互賴關係在近年以來快速增加，但就中印雙方的貿易關係來看，貿易因素不太可能是雙方在這次事件中自我節制的主要原因，彼此各自的大戰略考量可能才是更為重要的因素。

## 二、貿易如何為雙方帶來和平或衝突

在國際關係的自由主義典範中有三大和平理論：「民主和平論」認為，戰爭或是軍事衝突極少發生在兩個民主國家之間；「貿易和平論」認為，隨著兩國貿易互賴程度的增加，雙方發生戰爭或是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就會降低；最後，「國際制度和和平論」認為，若兩國之間能夠建立起國際建制來促進合作與解決爭端，則兩國發生戰爭或是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就會減低。<sup>1</sup>在這自由主義的三大和平理論中，「民主和平論」和「國際制度和和平論」的效果都相當穩定，然而，「貿易和平論」的效果至今仍充滿爭議，雖然大多數的經驗研究都顯示隨著兩國貿易互賴程度的增加則雙方衝突的機率就會減低，然而仍有不少經驗研究不斷地提出相反的證據，至今，「貿易和平論」的效果並未如「民主和平論」或是「國際制度和和平論」的效果那樣得到學者的共識。<sup>2</sup>

為什麼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可能會減少兩國衝突發生的機率呢？若我們整理貿易和平論的文獻，可以發現貿易主要是透過下面三種途徑來達成減少衝突發生機率的效果。第一種途徑是透過「提高衝突的機會成本」來達成，這個途徑認為貿易互賴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是有利可圖的，而使用武力會阻礙兩國之間的經濟往來，導致經濟上的損失，所以增加了使用武力的機會成本，因而降低了發生軍事衝突的機率。第二種途徑是透過「傳遞昂貴信號」來達成，這個途徑認為國家之間的貿易互賴也可以作為雙方真實的實力和意願的一種訊息傳遞，因為威脅使用貿易制裁是一種嚇阻的

---

<sup>1</sup> Michael W.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1st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Inc, 1997).

<sup>2</sup> 關於貿易是否能夠減少衝突的爭議可參見 Edward Deering Mansfield and Brian M. Pollins, ed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Gerald Schneider, Katherine Barbieri, and Nils Petter Gleditsch ed., Charles H. Anderton et al., *Globalization and Armed Conflic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Gerald Schneider, "Peace through Globalization and Capitalism? Prospects of Two Liberal Proposi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1, No. 2 (March 1, 2014), pp. 173–83。

來源，一旦衝突發生，雙方在威脅阻斷貿易的互動中可以了解對方的可信度和使用武力的決心，降低由於資訊不對稱而導致的軍事衝突發生的機率。第三個途徑是透過「轉化國家利益」的方式來達成，這個途徑認為貿易互賴會在兩國國內創造出從貿易中獲利的行為者，因為發生衝突將會影響到這些行為者可從貿易獲得的利益，所以這些行為者自然會想辦法影響決策者，不使決策者做出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政策決定。<sup>3</sup>從這三個途徑來看，貿易對於減低衝突發生機率的功能應該是相當明確的，兩國的貿易互賴程度愈高，則即使出現爭端應該也愈不容易使爭端升高到必須使用武力解決的程度，若以此來分析此次的中印爭端，則應該可以預期，如果雙方擁有一定程度的貿易互賴，則此次爭端演變成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應該甚低。

然而，學者們分析經驗證據的結果，發現貿易互賴能夠減低軍事衝突發生機率的效果並不是十分的穩定，雖然大多數的學者是發現雙方的貿易互賴愈高，則雙方發生軍事衝突的機率愈低，但仍有不少學者指出，這個貿易和平論的效果是非常受到前提條件的影響的，在某些條件下貿易可以減低衝突發生的機率，但是在另一些條件之下，貿易其實是會增加衝突發生的機率。在文獻中，比較重要的前提條件有以下幾個：第一，有學者們發現這個「貿易和平論」的效果在高發展程度的國家或是高民主程度的國家比較穩定，在發展程度較低或是民主程度較低的國家則不是那麼明顯；<sup>4</sup>第二，有學者們發現雙方貿易的貨品組成、需求彈性與是否有可替代的第三方貿易夥伴是重要的關鍵，因為這些因素影響到貿易夥伴的可替代性，

---

<sup>3</sup> Scott L. Kastner, "Doe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Constrain, Inform, or Transform? Preliminary Evidence from the Relationship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Honolulu, HI, 2005).

<sup>4</sup> Michael Mousseau, "The Nexus of Market Society, Liberal Preferences, and Democratic Peace: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and Evid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7, No. 4 (December 1, 2003), pp. 483-510; Christopher F. Gelpi and Joseph M. Grieco,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Sources of the Liberal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5, No. 1 (January 1, 2008), pp. 17-36.

而在可替代性較低的貿易夥伴中，貿易和平論的效果最為明顯；<sup>5</sup>第三，有學者們發現，貿易是否能夠帶來減低衝突機率的效果，要看「可從貿易中獲利的行為者」和「因為貿易競爭而受到損失的行為者」這兩個團體哪個能夠有效影響決策者而定，前者有助於減低衝突，後者則會減低貿易和平的效果；<sup>6</sup>第四，有學者們發現，雙方如果有貿易關係的話，也會因為貿易的經營而增加雙邊互動的機會，因此貿易關係也是一種雙邊互動程度的測量，而互動次數愈多的時候，自然產生摩擦與爭議的機會也就愈多，所以貿易應該會帶來雙重效果，貿易會增加「輕度衝突」或是「未造成人員傷亡的衝突」的次數，但會減少「重度衝突」或是「造成人員傷亡的衝突」的次數。<sup>7</sup>第五則是學者 Dale C. Copeland 所提出的著名的「貿易預期理論」(trade expectations theory)，認為當雙方都預期未來可持續從與對方的貿易關係中獲利時，貿易將有助於減低衝突發生的機率，反之，當至少其中一方開始預期雙方的貿易關係若持續演變下去將對己方造成愈來愈不利的

---

<sup>5</sup> Mark J. C. Crescenzi, "Economic Exit,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5, No. 3(August 1, 2003), pp. 809-32; Timothy M. Peterson, "Third-Party Trade,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Dyadic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8, No. 2(March 1, 2011), pp. 185-200; Timothy M. Peterson and Cameron G. Thies, "Beyond Ricardo: The Link between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Pea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 04(October 2012), pp. 747-767; Erik Gartzke and Oliver Westerwinter, "The Complex Structure of Commercial Peace Contrasting Trade Interdependence, Asymmetry, and Multipolarit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3, No. 3(May 1, 2016), pp. 325-43.

<sup>6</sup> Etel Solingen, "Mapp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Domestic and Regional Impac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5, No. 4(December 1, 2001), pp. 517-55; Patrick J. McDonald, "Peace through Trade or Free Trad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4(August 1, 2004), pp. 547-572; Patrick J McDonald, *The Invisible Hand of Peace: Capitalism, the War Machin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薛健吾, 〈支持開放的國內政治聯盟對政治領袖的影響力：「貿易互賴」與「國際衝突」關係中的關鍵調節變數〉,《台灣政治學刊》,第19卷第1期,頁147-240。

<sup>7</sup> Jon C. Pevehouse, "Interdependence Theor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1(2004), pp. 247-266; Chienwu (Alex) Hsueh (薛健吾), *The Liberal Commercial Peace, Regional Consider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Latin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2015).

結果時，貿易則會增加衝突發生的機率。<sup>8</sup>當然，以上這些只是比較重要的前提條件，對於「貿易與和平／衝突關係」的更多的前提條件的尋找，至今依然是學者們持續在研究的重要議題，不過我們已經可以得到一個明顯的結論，那就是，貿易是否能夠減低雙方發生軍事衝突的機會，是受到許多前提條件的影響的。下一節將分析中印雙方的貿易互賴關係與前提條件。

### 三、中印貿易關係之分析

圖一是從 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歷年來與印度的貿易總額變化，從圖一中可以看出，雙方的貿易額在中國加入 WTO 以後即快速增加，從 2001 年的 65 億美元直線上升到 2011 年的 1,017 億美元，十年之中翻了 15 倍之多，之後在 2012~2014 年之間都穩定維持在 900 億美元左右的高水準。<sup>9</sup>根據 Penn World Table 9.0 的資料，在 2014 年時，世界上有將近半數的國家的 GDP 總額其實還不到 900 億美元，<sup>10</sup>因此，單從貿易額來看，中印雙方的貿易互賴關係確實在這十餘年來逐漸加深，並且已經達到相當程度的規模。

接著，本文檢視中印雙方彼此是對方多重要的貿易夥伴。對印度來說，從 2001 年一直到 2006 年，中國一直都是印度的第 2 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從 2007 年開始，中國一舉超越美國，一直到今天都是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而對中國來說，在 2001 年時，印度是中國的第 18 大貿易夥伴，此後排名持續上升，到了 2014 年時，印度已經是中國的第 11 大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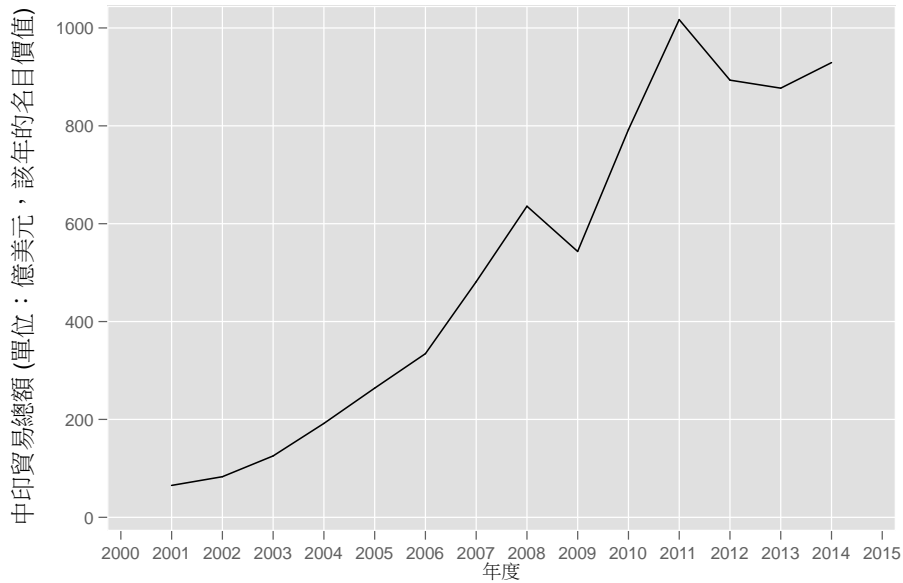
<sup>8</sup>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April 1, 1996), pp. 5-41;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sup>9</sup> Katherine Barbieri and Omar M. G. Omar Keshk..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Trade Data Set Codebook, Version 4.0., (2016), <http://correlatesofwar.org>.

<sup>10</sup> Robert C. Feenstra, Robert Inklaar, and Marcel P. Timme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5, No. 10 (October 1, 2015), pp. 3150-82.

易夥伴。<sup>11</sup>

圖一 中國加入 WTO 後與印度的歷年貿易總額



資料來源：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Trade Data v4.0。<sup>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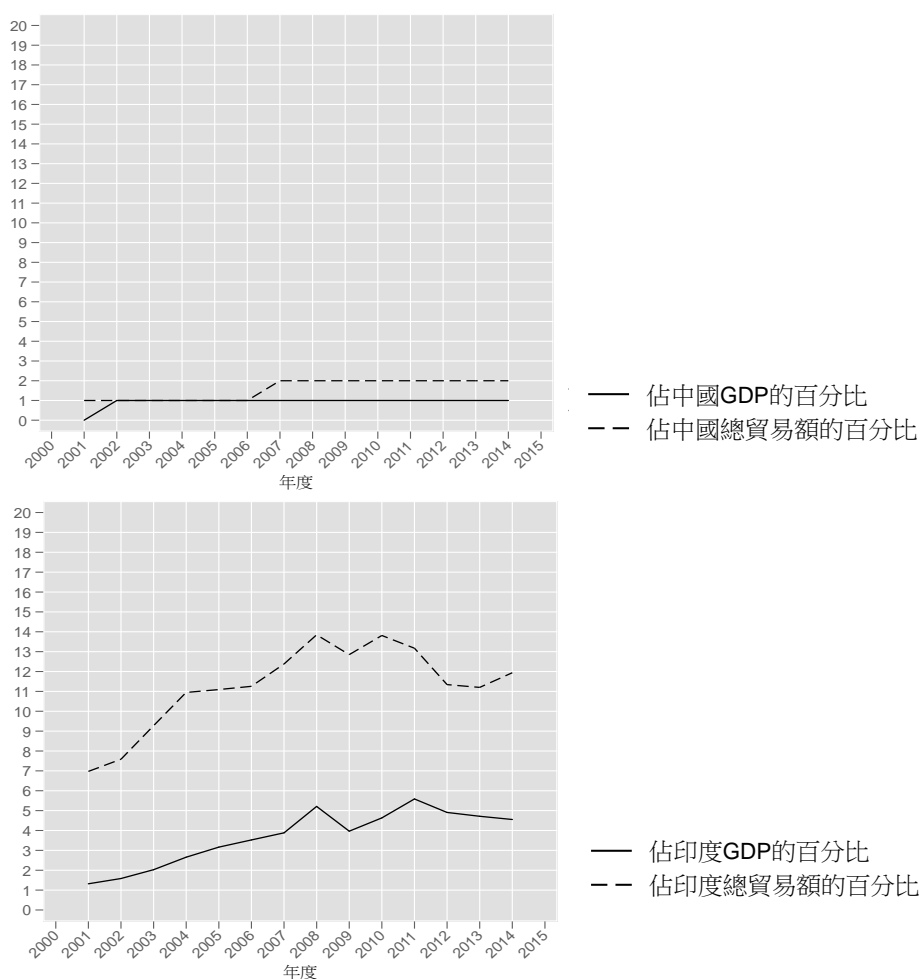
然而，貿易總額高或是彼此都是對方排名在前的重要貿易伙伴，並不直接代表雙方的貿易關係對於雙方的經濟組成具有相等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在圖二中分別檢視中印雙邊的貿易額佔兩國總體經濟(GDP)和總貿易額的比重，從圖二中可以看出，雖然雙方的貿易額成長快速，但由於雙方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因此雙邊貿易額即使相當可觀，但事實上對於兩國整體經濟的重要性並未如想像中大。對印度來說，與中國的貿易額平均而言大約佔本身 GDP 的 5% 左右，佔總貿易額的 12% 左右，可以說印度對於中國有一定程度的貿易依賴度，故雙邊貿易應能對於印度方面產生一

<sup>11</sup> Barbieri and Keshk, 2016.

<sup>12</sup> Barbieri and Keshk, 2016.

些節制衝突的效果；但是，對於中國來說，與印度的貿易額平均而言只佔了本身 GDP 的 1%不到，佔總貿易額的 2%不到，中印雙邊的貿易對於中國整體經濟的貢獻可說微乎其微，故貿易因素對於中國方面的節制效果可能較低。

圖二 歷年中印貿易額佔兩國 GDP 和總貿易額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Trade Data v4.0。<sup>13</sup>

<sup>13</sup> Barbieri and Keshk, 2016.



如果從中印雙邊貿易的商品組成來看，由於兩國都是低勞力成本的製造業大國，皆處於世界供應鏈中的工廠角色，因此雙方對於對方的出口商品組成都包山包海，種類繁多，且雙方都經常抱怨對方國家的產品品質不佳，不過理論上的關鍵點在於，在雙方的貿易商品組成中，「能源」、「原物料」或「高科技設備」這幾個可替代性較低的重要項目都不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因此彼此商品的可替代性都極高，對雙方來說，都難以透過「威脅切斷關鍵商品的供給」來達成經濟威壓的目的，也缺乏「一旦出現衝突將面臨關鍵商品供給不足」的顧慮。

再次，如果我們考量到印度和中國的政局和發展程度，也將發現，除了兩國都是屬於開發中國家因此貿易對於衝突節制作用的影響本來就不那麼顯著之外，與雙邊有貿易利益的行為者，在兩國的決策過程中，也難以扮演有重要影響力的角色。在印度方面，雖然號稱是擁有超過半世紀歷史的民主國家，但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上，階級政治和地方政治的考量更為重要，從對中國的貿易中所獲利的行為者在印度的政壇上並未明顯形成一個有影響力的政治勢力。而在中國方面，其非民主政治的特質，也同樣使對印貿易獲利的行為者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大打折扣，更遑論在事關「民族大義」的領土爭議中，民族主義的政治正確性在當今的中國絕對高於貿易的考量。最後，關於「貿易增加低度衝突的次數但減少高度衝突的次數」和「貿易預期理論」這兩個說法，前者與本次邊界爭議的引發並無直接關係，而從後者來看，在目前中印兩國的貿易關係中，並未出現「若繼續與對方貿易則自己將愈搞愈窮」的相關論述，因此也不太可能是影響到本次中印邊境衝突的前提條件。

總結來說，對於中印雙方貿易關係的初步分析顯示，中印的貿易額度雖然逐年增加，但對於彼此來說都不是重要的經濟命脈，彼此貿易的商品也並非難以從第三方獲得的重要商品，再加上在理論上許多可以讓貿易有

效減低衝突發生機率的關鍵前提都沒有在兩國中出現，因此「貿易和平論」在本次中印邊境爭端中應該難以帶來節制衝突的效果。如果是這樣，那使雙方駐軍寧可用互丟石塊的方式表達不滿而不願意以實際動用武力來解決領土爭議的重要原因可能又是什麼呢？

#### 四、比貿易更重要的事

正如 Snyder 對於 Copeland (2014)一書的評論所言，若查閱歷史紀錄可以發現，在曾經發生過的重大戰爭中，貿易因素很少在決策者的討論中被納入考量。<sup>14</sup>即使貿易和平論的效果在計量分析的研究中獲得多數學者的肯定，但貿易互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達到約束軍事衝突的效果、貿易因素在決策者做出處理爭端的政策決定時到底有沒有被納入考量，事實上在個案研究的文獻中極少有證據可以證明貿易在其中確實發揮了重要的效果。其關鍵在於，對於戰爭進行個案研究的文獻顯示著，有太多的事情在決策者的眼中或是在國家的整體利益上都比貿易來得重要的多。對中國的決策者來說，如何處理好國內統治的問題和經濟發展的問題才是首要的任務，如何在既有的體系下獲得最大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而又不致引發周邊國家起而反抗才是重要的課題，<sup>15</sup>更何況在近年來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大戰略的背景下，在「一帶一路」的陸路和海路都位居中樞位置的印度，更是中國所必須要積極拉攏合作的對象，在中國這個大戰略的考量之下，與印度發生大規模的軍事爭端以解決領土問題或是獲取更多位於荒涼山區的領土，完全不符合中國更大的戰略利益。而在印度方面，從二戰結束以來確立至今的「不結盟外交政策」，更是使印度在與各個大國的周旋中獲得不少議價槓桿，在不與任何大國建立正式聯盟關係的同時，又可

<sup>14</sup> Jack Snyder, "Trade Expectations and Great Power Conflict—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3 (January 1, 2016), pp. 179–96.

<sup>15</sup>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隨時跟各大國暗示著，如果不給予印度一定程度的利益，印度大可以扮演一個「有用的搗亂者」的角色，對於各個大國在印度洋或是中亞地區的布局帶來諸多的變數，<sup>16</sup>在這個印度大戰略的脈絡之下，與中國展開大規模的軍事衝突，無異於破壞這個長期以來所奉行的不結盟大戰略，而被迫必須與中國決裂，而且還得在親中國和反中國的國家之間選邊站，果真如此則印度在國際事務上的可操作空間勢必大為限縮，也完全不符合印度更大的戰略利益。從這個中印雙方的大戰略與整體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中印邊境衝突之所以一直沒有擴大為真正的軍事衝突，其背後有著許多比貿易考量更加重要的原因。

## 五、結論

在自由主義典範的三大和平理論中，「貿易和平論」的效果是裡面最不穩定也最受限制的，除了貿易對於國家的整體經濟必須足夠重要、也必須要是決策者的重要考量之外，各種前提條件的影響也至關重要。目前看來，在這次的中印邊界衝突中，由於許多前提條件都不滿足，因此貿易所扮演的因素應至為有限，應該不能為節制雙方的衝突帶來太大的效果，如果中印之間最終都未發生重大衝突，那也是因為其他因素的考量，而不是因為兩國貿易互賴的程度夠深的關係。總之，貿易考量在這次的中印邊界衝突中並不是重要的影響因素，雙方各自在大戰略上的得失考量，應對於雙方的衝突節制有著更大的影響力。

責任編輯：賴郁璇

---

<sup>16</sup> Sumit Ganguly, *India's Foreign Polic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